

张光直学术作品集

Khanty-mansijski restitucijiprije



张光直学术作品集

美术、神话 与祭祀

张光直 著
郭净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术、神话与祭祀/张光直著；郭净译. -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2

(张光直学术作品集)

ISBN 7-5382-0486-5

I . 美… II . ①张… ②郭… III . ①美术 - 研究
- 中国 - 古代②神话 - 研究 - 中国 - 古代③禁忌 - 研究
- 中国 - 古代 IV .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8805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数:120 千字 印张:5 1/2 插页: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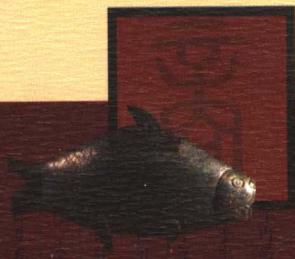
印数:1—5 000 册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柳青松 王之江 胡大为 责任校对:李守勤
封面设计:杜 江

定价:11.00 元



我心不存于世，而居于家，乃可得其乐也。



商

美术、神话与祭祀



◎在哈佛大学，80年代末期

周
美术、神话与祭祀



◎与夏鼐在亚洲地区（中国）考古
会议上 [1983]



◎与苏秉琦 [1992]



◎由徐莘芳陪同访问洛阳（古墓博物馆）

周

美术、神话与祭祀



◎张光直、洪炎秋、芮逸夫、李卉在耶鲁大学 纽黑文 [1958]



◎在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 [1975]

《美术、神话与祭祀》新版序

陈星灿

这本书是张光直先生最为珍爱的个人著作。他不止一次跟我说过,他喜欢这本书,原因之一是因为它是写给一般读者,而不是写给考古学家的。所以写起来轻松,读起来也轻松。这样的话,张先生也对别人说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本普通的科普读物。实际上,从它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来说,它是道道地地的阳春白雪,不过喜欢它的人也确实很多。这是站在学科顶峰的人,才能写就的大手笔;也是张光直先生一生研究中国上古史的综合性论述。

本书以 *Art, Myth, and Ritual: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 为名,首先于 1983 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两年后,台北的弘文馆出版社,将该书翻印出版。1988 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郭净、陈星的中文译本(王海晨校),题为《美术、神话与祭祀》。张光直先生为本书写了《〈中译本〉作者前记》。1993 年,本书在台北由稻乡出版社出版了繁体字本。至此本书开始在海峡两岸风行。1994 年,日本东京的东方书店出

版了由伊藤清司、森雅子和市瀬智纪的日译本，书名改为《古代中国社会——美术、神话、祭祀》。日译本小32开，加了封套，新增不少注释并重新安排了插图，装帧和图片的质量都比原著有很大提高。当然价格也不菲。张先生为日译本写了序言，向日本读者介绍自本书出版后十年中国考古学的新发现，并以此检验他的综合性的研究成果。

尽管这本书以中英日三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流行，但张先生还是最在乎它在中国的反应。他对既有的中文本不很满意，一直都想亲自翻译此书。但是由于他忙于公务，而且身体一直在走下坡路，所以始终没有来得及动手。同辽教签订出版合同前后，先生曾一度想让我重译这本书，后又告诉我台北的南天出版社已经请人翻译了新译本，也许辽教可以同时出版这个新译本。但是由于版权等方面的原因，张先生随后又同意辽教可以出版自己的新译本。这时已是1997年岁末。为节省时间，辽教委托我重新审校郭净先生等的译本，这样既无版权问题，又能借此机会尽快将校本送请张先生把关。张先生同意这样的安排。1998年2月5日，张先生从台北发来电传，说“有关《美术、神话与祭祀》，请兄将您现在重新校审的定稿寄下，我好与我们这边的比较，我在收到稿件两天之后，保证有个决定。也许可以分成辽教版与南天版，但我想看了辽教版再作决定。”我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对着原文重新校对了一遍，同时也参照了日译本。随后，我把这个校本，寄到先生在台北的寓所，请先生审定。先生仍然不是很满意这个校正本，但是他实在已经力不从心，只改正了几处错误，就把它寄回到了辽教。他同意辽教出这个新校本，从此再也没有跟我说起过南天版，实际上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看到南天版

的新译本。

经张光直先生审定的新校本，改正了不少翻译和印刷错误，读者比较新旧版本的不同，区别当可了然。

我借以校对的原书，是 1994 年 2 月 14 日张先生在哈佛送我的台北翻印本。1999 年，为保证中文新版图片的质量，我请在哈佛任教的李润权先生寄来哈佛大学出版的原著，但是发现原著与台北的翻印本没有什么不同，纸张粗糙，图片的质量也不高。我参照的日文版，是 1994 年同在哈佛进修的日本庆应大学学者桐本东太先生赠给我的。桐本是伊藤清司先生的学生，学习中国古代史和中国民俗学，曾在北京师范大学留学。在此我谨向李润权、桐本东太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书并张光直先生的其他辽教版著作，原以为可以在 2001 年 4 月张光直先生 70 岁生日之前出版，借以为先生贺七十寿。但是，就在跨入新世纪的第三天，先生却驾鹤西去，再也无法回到他热爱的故土。愿这本新版的《美术、神话与祭祀》能够带给先生我们无限的悼念之情。

2001 年 1 月 24 日上午于郎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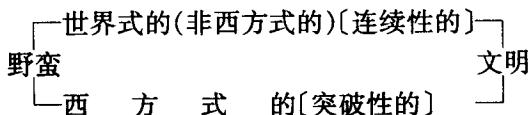
译者的话

古往今来，中国文明在整个世界文明的体系中占据着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它的价值何在？它的特征是什么？这些都是置身于当今变化的文化环境中的人们所不能不思考的问题。本书的作者张光直先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为我们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这个角度就是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寻。本书的论述对象——夏、商、周三代，恰是中国这块土地上最早诞生的文明。张先生认为，就世界范围来看，文明的产生，即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为契机，通过技术的突破，通过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的变化引起社会的质变；另一种则以人与人关系的改变为主要动力，它在技术上并没有大的突破，而主要是通过政治权威的建立与维持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前者以古代两河流域的苏末(Sumerian, 又译为苏美尔)文明为代表，其特征是金属工具在生产和灌溉中的大规模运用，贸易的扩展，文字对经济的促进，神权与国家分立等等。它成为近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来源。后者则以玛雅——中

国文化连续体为代表,其特征为金属在政治与宗教活动中的广泛运用,政治分层系统与网状结构的形成,文字和艺术成为宗教的附属品,成为天人沟通的工具。如果说前者在兴起的时候突破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束缚,并与旧时代之间产生了断裂;后者则从史前继承了各种制度、观点与仪式。

这两种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方式可以用一个图式来说明(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17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张先生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中国——玛雅文明曾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世界式”的;而苏末文明在其产生的时候只是一种例外。这个观点,无疑是对中外传统历史观的严重挑战。其含义非常明显:随着西方文明在近代的全球性扩张,它所孕育的各种思想便成了说明所有历史现象的惟一准则(详见本书第7章),这些基于人类一部分历史事实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不可能适用于人类文化的一切方面,也不可能解释人类文明的全部进程。因此,现在是从总结普遍规律的立场出发来研究中国文明史的时候了。“根据中国上古史,我们可以清楚、有力地揭示人类历史变迁的新的法则。这种法则很可能代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文化连续体的变化法则。”(《考古学专题六讲》24页)显然,这也是对传统的形式主义二分法和“全盘西化论”的一个挑战。人类的文明只能用人类历史的全部事实加以说明,中国历史也将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这部著作中,张先生利用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和神话

学的各种材料,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它早期的特征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其关键是政治权威的兴起与发展。而政治权力的取得,主要依靠道德、宗教、垄断稀有资源等手段,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天地人神沟通手段的独占。古代中国文明有一个重要观念:把世界分为截然分离的两个层次,如天和地,人与神,生者与死者。上天和祖先是知识和权力的源泉。天地之间的沟通,必须以特定的人物和工具为中介,这就是巫师与巫术。统治者只要掌握了这二者,以及附属于他们的艺术、文字等物事,就占有了与上天和祖先的交通,也就取得了政治的权威。可见,三代的统治带有强烈的巫术色彩,这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即“中国古代文明是所谓萨满式(shamanistic,即巫觋式——译者)的文明”。这是一个极为新颖的启示。巫觋文化不仅笼罩了三代,甚至在以后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从上层统治者的封禅求仙,到普通老百姓的算命打卦;从秦末陈胜吴广的荒郊狐鸣,到清代莆田人民的设醮祈雨,莫不有它的影子。巫术文化在中国文明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确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课题。

作者研究问题的方法,也是我们深感兴趣的一个重要方面。张先生的本行是考古,他早年就学于北京和台北,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以后又在美国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历聘为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主任,皮巴蒂博物馆馆员,对宾弗(Lewis Binford)的“新考古学”理论、韦伯(Max Weber)的社会政治观点、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和李奇(E. Leach)等人的婚姻理论以及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的“二分现象”分析都非常熟悉,能自如地加以评价,并创造性地运用于研究之中。对中西文化的

深刻了解与把握,是近代以来有所作为的学者普遍具备的基本素质。他们“兼通中西,在研究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兼及欧美学术思想发展的新方向,又能因为‘中学’的根底,而对一般性的问题提出新的有批判性的看法,从而对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发展前途上,提出创新的见解。”(郑培凯:《大洋彼岸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书院学报》1984年4期)兼通中西,正是国内青年学子所努力的方向,也是中国文化研究持续、深入发展的基础。

欲全面了解张先生理论的读者,可将本书同他的另外两部著作结合起来阅读:一部是《考古学专题六讲》,书中对两种文明的发生方式和中国古代文明的基本特征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另一部是《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版),这是张先生1961—1981年所写论文的汇编,对三代文明的各个方面作了详尽的专题论述。

由于笔者学识有限,译文中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读者见谅。

郭 净

1987年8月3日于昆明

中译本作者前记

《美术、神话与祭祀》这本小书是在我历年“出土”的拙著中我自己最为喜爱的一本。所以喜爱它并不是因为觉得它写得最好、最为成熟，而正是因为它是最为不成熟，也就是最为年轻的一本。它是从我在数年前为了大学本科生（多是对中国文明或对考古对古史不熟悉的）所设计的一门新课的讲稿中选出来的。它的对象是一般的读者（听众）而不是专业的学者，所以写起来比较令我兴奋，比较使我少受专业传统的束缚，也可以算是对中国古史研究的一种方式的一次试验。多年来我一直主张中国的古史研究不属于狭窄的专业，而应当是由各行各业的专家——包括史学家、考古学家、美术史家、古文字学家、古地理学家、理论家等等——携手一起从各方面、各角度，利用各种的资料来从事进行的。这本小书是我在这个方面所做的试验中最彻底的一次，同时很自然地也就是最不成熟的一次。因为它不成熟，它更有进一步大幅成长、开花、结实的机会，也就像人在青年，如果努力修习，更可前途无量。不用说，要它有进一步的发展，它更需要读者的批评与建议。